

●時報書系532

熊十力與劉靜窗

論學書簡

劉述先／編



Iv67
L677

AW7808/03

熊十力與劉靜窗

劉述先・編

論學書簡



序

劉述先

一九七八年夏，我回到老家。闊別了近三十年的時間，這才回到母親膝下。離家時我已還是個中學生，弟妹們正當稚齡，如今卻各自早已成家，有了自己的子女，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所遺憾的是，父親早在一九六二年逝世。在談不完的話中，我才知道父親和熊先生通信交往的這一段經過。熊先生和父親的幾十通書信，由於無人整理，扔在閣樓上的一個舊帽盒中，所以才得倖存，沒有在文革時期遭到銷毀的命運，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。熊先生與父親的通信，適當他在寫《原儒》、《體用論》、《明心篇》、《乾坤衍》諸書的時刻，是極有價值的文獻。熊先生的信，有許多是明信片，有些答復就批在父親的信上，有些寫在爛紙上，但卻顯發出一股真精神。由於我根本不知道這些信件的年代、寫信的背景，也看不清熊先生的筆跡，根本無法整理這一批資料。同時更不敢輕舉妄動，免得這批寶貴的材料因處理不善而受到損失。所幸任弟雖然是學科學的，不治思想，但幼時耳聞目染，多少還能接得

上一點熊先生和父親的討論。他勉力就記憶所及，花了兩年時間，把先父和熊公論學書簡，全部依編年次序，重抄出來，實屬難能。然後將稿本連同原件輾轉託友人帶了出來，一直到今年春天，才到我的手中。這時我剛好把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《一書殺青，都三十餘萬言，交學生書局出版。七月下旬將返美，滯港期間，遂把其他計劃擱置下來，專心一志細看這一批材料，寫成「先父劉靜窗先生與熊十力先生在晚歲通信論學與交遊的經過」一文註，對於雙方論學辯難的線索有所剖析，並就我所知，補上了有關這些討論的背景。用這一篇文章做指引，再讀任弟整理出來的材料，就不難對這一重公案，有一清楚的掌握。再加上熊先生和父親筆跡的製版，就是極完整的一部小書了。而這一部書最重要的意義在，熊先生和父親在那樣的逆境之下，以自己的生命來印證自己所信奉的真理，不稍假借，可見傳統儒釋的思想實有其不可棄者在，值得我們深思。現在熊先生晚年寫的那幾部書在坊間都有流傳。最可惜的是，父親一生讀般若的心得卻在文革時散失了。所幸他還有隨感沉思錄，與友人論佛學書簡、詩詞感懷文存留下來，只有等我慢慢整理出來再找出版的機會了。

一九八〇、七、十一於香港中文大學

註：此文分二次刊於香港「中報月刊」第八期（一九八〇、九）與第十二期（一九八一、一）。下篇編者另加標題曰：「熊十力先生與先父的大辯論」。

先父劉靜窗先生與熊十力先生 在晚歲通信論學與交遊的經過

熊十力先生（一八八五—一九六八）註是當代新儒學極重要的一位開山人物。陳榮捷先生以英文著《中國哲學資料書》，在當代重建傳統哲學方面僅列馮友蘭、熊十力二人（頁七四三），卻指出馮氏聲名雖大而熊先生少有人知，其啓發力量卻鮮與倫比（頁七六五），可謂知言。當代新儒學的重要人物，如牟宗三、唐君毅、徐復觀等諸位先生，多出於其門下。熊先生的主要著作有《新唯識論》、《讀經示要》、《十力語要》、《佛家名相通釋》諸書。大陸易手以後，又出版《原儒》、《體用論》、《明心篇》、《乾坤衍》諸書，是爲其晚年思想定論，基本慧識雖不變，然有些意見則與前頗有出入。這些書現在坊間雖有流傳，但對熊先生撰寫這些書的實際背景則鮮有人知。家父劉靜窗先生（一九一三—一九六二）由儒入佛，宗主華嚴，以摯友張公逸先生，於一九五一年起與熊先生通信論學。張先生爲熊翁之及門弟子，一九五三年由滬至北京供職，熊先生則於一九五四年寫完《原儒》上卷，由北

京南移到上海居住，到一九六一年寫畢《乾坤衍》為止，八個年頭以來，家父於熊先生是極親密的一個人。雙方論學，以立場出發點不同，始於不合，辯論劇烈，而終於互尊所聞，由絢爛而歸於平淡。熊先生於一九六一年尾乃有「八年來唯君子終始相親，慰孤苦，相依爲命」之語。不幸先父於一九六二年四月逝世，熊翁高年親自來家弔唁，並書勉任震二弟，鼓勵他們努力學問，不可孳孳爲利。熊先生是於一九六八年八十五歲時逝世。最近，熊先生給先父的數十通親筆函片，始輾轉傳到我手中，我覺得我有責任把這一重公案公之於世，因有本文之作。

父親是在讀完熊先生的《論張江陵》之後於一九五一年（辛卯）八月二十日寫第一封信給熊先生。在此前，他已經讀過熊先生的《新唯識論》、《讀經示要》諸書。一九五三年他做了一首詩送給熊先生，並附小序，略述彼此通信的經過，現將該詩抄在下面：

「熊子眞先生京中度七旬壽辰賦寄奉賀並序」註

向余讀子眞先生書，而敬其爲人。辛卯秋，始因摯友公逸之介，稍通函候。前歲先生嘗約北遊，遷延未果。今年癸巳，先生壽晉古稀，聞將繼《新論》之後，重興舊願，寫作《量論》，不亦強歟。千里馳風，情意難勝，因抒雜懷，奉呈堯正，並祈碩德永年，爲後師法云耳。

先生著論自成家，磊落胸懷未有涯。一息坤乾欣未老，夢中遙想筆生花。

龍樹汪洋千論師，低徊漢宋復何之。釋儒參到深深處，正直如公未可衰。五年前讀老翁書，融貫諸家興有餘。量論重聞新試墨，篇成伯仲願無虛。舊時破論慙宜黃，才大心微各短長。師資迄傳當代盛，反成之際見文章。

附註：先生糅合儒釋，著《新唯識論》。宜黃歐陽大師未以為然，門下守師法者因而著論破之。先生重作《破破論》，以伸其說。實則所據不同，自難望合也。

七十老翁世未稀，但悲斯學日幾微。公當繼絕宜長壽，珍重人間片夕暉。」

如果詩中所言是紀實的話，那麼父親是在四十年代尾讀了熊先生的著作；對於熊先生十分佩服。我第一次聽到熊十力這個名字，就是因為父親的來信中提到他。父親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函中節鈔了《讀經示要》一節，要我玩味細讀，並曰：「熊氏有《讀經示要》及《新論》等書，多精粹見道之言」。所節鈔的一節要人不可自隘識量，熊先生認為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」的攻字不可訓作治字，聖人識量，豈若是狹，故《論語》的意思是不可任胸臆之見，排擊異端，中西學說都可以研究，而後可以觀其會通。一九五一年春我還在讀高三，但課餘之暇，已經在讀哲學概論一類哲學的入門書，與父親的通信中提出了一些哲學的問題。父親一方面由佛學的觀點對我所提的問題有所解答，另一方面又要我讀佛經以及儒家的重要典籍。蒲節一函又特別介紹我讀熊先生的《示要》、《新論》二書。到了秋天，我考進臺大哲學系，父親託友人寄了一大批佛書給我，中間附了一本熊先生的《摧惑顯宗記》。父親十月廿四日函提到這本書，說它是「《新論》熊翁近著，雖評評之作（參考印順《評熊著新唯

識論》，然實借題發揮本懷。熊翁於此書極珍視，余於其論點未盡同，其精闢處極可引發睿思也。」十月廿九日又來一函要我詳讀這本書，但說：「其論佛家生滅、不生滅截成二片之說，與我觀點不同，曾往復多次辨論。而其倡導儒釋，究明本源之類，則余深敬之矣。今海內治古學，通世故，舍熊翁與陳寅恪先生外，蓋難其人。」可謂對於熊先生備極推崇。但因父親的來信語焉未詳，當時並不很清楚他們辯論些什麼。一直到現在看到父親的遺稿和兩造的通信，才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觀念。

父親是由張公逸先生處借讀了《論張江陵》一書，並向張先生之請，寫了「讀《論張江陵》」一篇短文。在這篇文章之中，父親表示了三點意思：第一、熊公是體究本源之學，雖然佛學所得多於朱（熹）王（陽明），然諷之以為淪空滯寂，父親就感覺到「不免間然」。因為由父親的觀點看，「淪空滯寂者，所訶為二乘之學也，〔蓋指聲聞、緣覺，未臻了義之學。〕苟得源頭樂處，則活潑生生，即此生滅世間，莫非當人如如之境矣，云何滯在空寂？」父親所宗主為華嚴的大乘圓教，故不以熊先生對佛學的批評為然。其次，父親又指出：「儒者體仁，釋者首悲，自來真見本者，無不以利濟羣生為其學，為其行。末流不知方便，淪守虛明。本源之論，徒益口談。用遺而體亦虧，此東學大病也。」在這裏，父親與熊先生深具同感。然而傳統的經濟觀點，只說均平之義，以抑豪強，畢竟生機未暢。故「江陵當國九歲，雖功績可數，而身死難繼，卒無以挽明之危亡，則亦可以深思其故也。」熊先生於此，似乎還言之未盡。最後講夷夏之辨，必爭取民族之獨立、平等之地位。各國文化互相觀摩，取長截短，才可以嚮往大同的理想。必以體源之學與科技之學互濟，始不至於偏向一

邊，造成銅疾，羣生燈苦，無有已時。

大概張先生看了這篇文章，極力勸父親直接與熊先生通信請益。父親遂修書並滙款，一方面表示仰慕之意，同時並請購《論張江陵》一書，以及新出之《摧惑顯宗記》與《論六經》二書。寄書似因郵誤而有一些問題，在通信之中，父親趁機提出心中的疑點。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函，一則懷疑熊先生之評佛學，以為截生滅、不生滅爲二。父親所持的理由是：「滯有者凡，偏空者小。菩薩觀空無不見色，觀色莫非見空，無障無礙，爲一味法，曷嘗二事。學佛正因，率由般若。般若依二空（人空、法空）顯，二空因蘊界〔五蘊〕出，不容辯矣。謂般若由空顯即可，謂爲滯空，不有期期者乎？」明顯地，這是大乘圓教的觀點，隱指熊先生的批佛，用於始教的唯識或者有相當理由，但不必能用來批評大乘圓教的體證。其次，父親又懷疑熊先生在《論張江陵書》之中是跂士大夫而論焉，蓋世間所謂的士大夫，非必儒家所謂的士大夫，更不必附合儒者的本懷。

熊先生九月廿五日有長信答復，仍堅持大乘空有兩宗並將生滅、不生滅與有爲、無爲折成二片說去。其言不生滅或無爲時，決不許道生或無不爲。其談到生滅或有爲方面，則空宗以四緣（因緣、等無間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）是凡夫顛倒虛妄法，不能說是真體之顯現；有宗種子說的一套複雜的宇宙論，更把種子現行（生滅）與真如（不生滅）打成兩橛；決不能與儒家之明明德、致良知之說相比擬。熊先生並要父親仔細讀《摧惑顯宗記》以明儒釋之分疏。關於《論張江陵書》岐士大夫爲二之事，熊先生說明他所謂士大夫爲在位者之通稱，猶今所謂官僚也。而四民之士農工商中之士，則並不在他所謂的士大夫之列。江陵論政在爲小

民謀福利，不當偏利於在位者。

父親在九月廿九日又復一長信，歷述自己研學的經過，因讀明紫柏老人「釋毘舍浮佛偈文」而有所悟。毘舍浮，此云自在覺。其傳法偈云：

假借四大以爲身，心本無生因境有。

前境若無心亦無，罪福如幻起亦滅。

父親的意思是由般若入手，接上禪、天臺，而歸本於華嚴。賢首曾依日照三藏，判西域智光、戒賢空有二宗並爲始教，未許了義。則內學院歐陽大師之宗主法相唯識，與熊先生所批評，都不是究竟。到了華嚴境界，則「空是真空，有歸妙有，所謂華嚴世界所有塵，一一塵中見法界，雖欲歧之爲二，有不可得者矣。」即空宗之講真俗二諦，所謂觀空不證，涉有不著，而無所謂難融。

熊先生十月三日復函遮發這些，以爲話頭。並謂如重實修，根本不必多涉佛典；如欲博究理道，則不讀佛典，難了儒家。在數次通信之後，熊先生大體已經了解父親的出身背景。父親在北大經濟系畢業。身體奇差，抗戰時留在上海事親，根本沒有出來做事，因偶然的機緣始游心於內學。只勝利以後，在善後救濟總署服務了一個時期。一九五〇年，因患腎結石，割除一個腰子，此後一直賦閒在家。熊先生要父親專心學術，所謂「斯文存一線，吾甚望有人」，乃邀父親北上，與之同遊一個時期。並要父親注重營養。因父親素食多年，熊先

生卻認爲不妨肉食，如志於學，弱軀恐不勝。

父親十月六日答書曰：「荷召來春北遊從學，固所願也。至時如世緣相許，便當如命。」熊先生十月九日來信，認爲六朝諸宗派之談佛，將有爲、無爲說得圓融，因其皆從道家入佛，不必是佛家本旨。父親十二日復函則謂「此土衆生，久經孔孟老莊教化陶融，氣象自是不同。佛法東來，攝機融貫，發而爲賢首、爲天臺、爲禪，蓋有若決江河、沛然不容已之勢矣。諸家宗旨，雖與天竺各派或不盡似，究不離三法印，就是釋迦親血脈，斯不謂之佛家不可也。融釋入儒，自當讓席宋明諸老，則亦無礙並行矣。」視域終與熊先生不同，事至顯然。而父親之爲學必銷歸已分上，與一般學術界之客觀進路自更不是一回事。

那時父親正因姑母患癌病在滬就醫，日夜奔走，心力交瘁。父親雖是佛徒，但在世間，卻最重視親子昆弟之情。適讀熊先生《論六經》一書，乃有所感發而不能不有所回應。熊先生極贊《周官》。父親則認爲，「《周官》誠廣大矣，自有精意者存，先生推衍微言，爲世取鑑，俾知先民用心締造之眞，後生無自菲薄，進而于民族文化知所荷承，大同邛治，知所推展，不其盛乎。若謂先人設制，已盡善美，帥意模楷，不疑有鑿者乎？」

其實熊先生註書多六經註我，借古諷今，疏於考據之事。《周官》一書，近世頗有人以爲僞作，而熊先生自信頗堅，根本不容許商討之餘地。而熊先生晚年引起爭論最烈之一點即攻擊孟子以孝治天下，而直斥秦漢以來二千年之學者爲奴儒。父親則辯稱孝弟爲儒學根本，世流之弊，不足爲孟子病。後世儒者也未始不想以孝弟之理想規約人君，至專制君王利用儒學陰遂其私是另一回事，似當別論。譚嗣同曾有憤激之語，乃云二千年來之政，秦政也，皆

大盜也；二千年來之學，苟學也，皆鄉愿也。譚氏語旨已不無問題，至少鄉愿一辭見于孟子，則所謂奴儒，不如逕斥之爲鄉愿之爲愈也。父親的意思是必在眞儒與俗儒之間立一明確之分界線，孟子的精神直承孔門血脈，不能以儒學末流之失來詬病孟子。

熊先生十一月十六日來片只簡單聲明，論經之事絕未反對孝弟，只反對孟子以孝弟參入政治意義。但他堅持漢以來大儒始終奉夷與盜爲天爲帝，勸孝勸忠。他要父親讀史，並謂不同意，幸勿復。父親十一月廿日有一短簡給熊先生，自訟「先民之學，本孝弟，本人心，撫躬自驗，理實無爽，而篤行不至，我慢時滋。日月逝矣，天地悠悠，椎心之痛，寧有已乎。乾乾夕惕，學以思過，不復有辭。」熊先生卻誤會我慢一辭有諷刺他的意味。父親於十一月廿七日乃不得已又有一長函，力言現實政治之道德基礎；並聲明自己日思補過，而患未能，請益無方，敬長尊賢之誼，未敢有懈。熊先生的懷疑，不免過矣！

熊先生回一片，略謂多寒老人難過。後來又有一片謂曾發頭昏，倒地一次。父親有信加以慰解。中間並寄所校《小品般若經》給熊先生。熊先生適忙於遷居之事，無意趣寫信，一直到翌年（一九五二年）十月卅一日移居十利海新址始來一片。父親與熊先生通信論學，始於一九五一年八月，到該年年底，算是第一階段，至此告一段落。

一九五二年除上述熊先生告以遷居之一片而外，似無其他通信。這時熊先生在重新刪改《新唯識論》。到了一九五三年，熊先生來信又重提舊議，希望父親在秋後來京小住。父親摯友張公逸先生上京供職之便，託他帶了一封信和桂圓、蓮子諸物給熊先生。熊先生四月來信表示謝意，但還是希望父親不要走佛家的路子。

到下半年，熊先生在十月廿三日忽來書，謂北方冬春氣候受不了，決定南移。熊先生哲嗣世苦先生任職招商船廠，雖也居住上海，但熊先生怕煩，也恐與兒媳相處不易，希望依父親了此餘年。據任弟相告，父親雖然也有這樣的意思，但與母親相商，實在家無餘室，兒童嘈雜不堪，不能不加婉拒，深感遺憾。但熊先生仍託父親代覓居所，然一九五三年終未成行。父親致友人書提及十月間「曾得熊公寄《新論》近刊本，已略讀一過，此老挺然，爲學大段可敬佩，亦頗有不同意處（自心腔子裏事，非關門戶之諍）。」五三年熊先生七十大壽父親賀詩小序提及熊先生繼《新論》之後，又重興舊願，寫作《量論》。但這個願心似乎始終未能實現。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八日熊先生來函謂現正寫一稿，是關於國學者，此書寫好，決不再寫。按，這部書即是《原儒》。據《原儒》序言有云，上卷以甲午（一九五四）春，起草於北京十利海寓廬，中秋脫稿，約十五萬餘字，翌年印存百部。秋天才起草下卷，到丙申（五六年）夏初脫稿，也有十五萬字左右，印存如前。是年冬全書再印，始以行世，當以此次爲初版，上卷稍有錯誤及遺字處，此次悉改正。

熊先生之離京，也還有一段插曲小故事。五四年八月張公逸先生由北京來函說熊先生將南下。他告訴父親，熊先生並不像宋明儒那樣講究涵養工夫，但真摯灑落，常有赤子之心。他的興趣在玄理與名相之析解。由於個性過強，自信過深，絕難有任何論辯及諍論。十一月一日又來函，說熊先生突於日前離京，行前未通知任何人。並說老人近年來心情不佳，最近以新著事曾面諍數次，亦頗使老人不快。希望以父親的修養涵養，能夠對老人有所照拂補益。

熊先生於十月廿九日抵埠，在十一月一日即來片，約父親去談談。熊先生住在閩北青雲路世苦先生住所的閣樓上，我家則在舊法租界，搭車去青雲寓，單程就要一二小時，來往十分不便，故不得不以通信為主。父親翌日即去拜訪請益，於三月有一函與熊先生。大概熊先生專講體用不二之旨，於佛家乃深斥之。父親則對佛家有所辯解，主要意思體用不二乃是終極境界，但現實人生苦惱衆多，必由此轉撥而後可以體證佛家之終極境界。儒釋之學儘可互相發明。父親之措詞或未盡善。熊先生即在函上加以此示，斷定佛家始於無明，爲無源頭之學。父親於十一月七日復函，說明自己對於無生一字有所體證受用，並謂體用不二雖是了義，然終必須分辨本末，不然或有以糟粕爲神化的弊病。父親的終極託付在佛，不似熊先生之終極託付在儒。至於在實際生活的安排，則熊先生一直想遷出獨居，父親則亟勸以古稀之年需要家人照料。父親的思想是佛家，行爲是醇儒，最重孝悌親情的體現；熊先生的思想是儒家，行爲則一味絕塵鷺，不耐家居瑣事的煩擾；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對比。

父親見到熊先生以後即有函致友人，一方面承認熊先生的苦心孤詣實有獨到之處，另一方面指出熊先生專講體用不二，而無視於踐履之實，猶無納言之忱，不能謂之爲無蔽。熊翁一家之言耳，敬老尊賢自可，要互相溝通是不可能的。父親大半生在病中渡過，所得爲實修之學，決不會因熊先生之猛烈排擊而遂改弦易轍。父親對易雖也有深厚興趣，然日課大般若、華嚴二經不輟。父親曾草就一函與熊先生辯駁，原稿猶存，而適得張公逸先生來書，極勸顧念老人，勿與剖黑白，辯是非，乃止不寄，而深深感嘆世間爲學之難。張先生於十一月廿八與十二月四日有二長書，由於感到父親與熊先生甫見，在情意上已稍見扞格，乃詳言種

種，固不能求苟同，然爲學術原因，也不可言決絕，此則當日介紹雙方通信認識之微衷也。

父親向來敬老尊賢，對於熊先生一貫持後輩之禮繼續請益。但熊先生似乎完全缺乏自覺，果於自信，竟要父親拋下一切，專讀他的《佛家名相通釋》。父親只得回信與以婉辭。

中間父親對於易有一些體會，乃於十二月二日寫信給熊先生請求印證。父親感覺到傳統註釋對於大易扶陽抑陰之義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，其實是有理存焉。父親的看法是：

「竊以陽之爲言，一也奇也，乾元也。陰也者，陽之變耦以自見其用也，相待生焉。乾喻於實體，陰擬于虛象。體之實者，挺然而自見。象之虛者，微然而自抑。天地本然之妙，理實如此，非意爲之也。此說若是，似與空宗言生滅如化、不生滅不如化者，旨義相通。不知有當否？祈先生教之。」

這自是一種玄思，未始不可成一理路。同函「再啓」之中又有一些有關中西思想之比較。熊先生來片卻謂，「扶陽抑陰，漢以來言易者皆如此，蓋專制之毒使然。坤卦曰：地道也，臣道也云云，此漢世奴儒所竄耳。坤元與乾元並稱，何抑之有？」又舉梁任公爲例，認爲「論中西學術短長，大可不必。」

父親將原函抄還，熊先生卻責父親「無一字答我，想不贊成吾之說。」又說：「漢宋羣儒都是擁護皇帝，把孔子六經都變了，不是孔子之真面目。……候吾之書〔《原儒》〕出，方知六經確被漢人變亂。」

父親乃委婉回信，但仍堅持己意，說

「乾曰健，坤曰順，陽生謂之復，陰長謂之剝，似不無分別虛實之意也。後儒以人事牽

強傳會者似別是一事，不宜相亂。此等意味早成腐朽，亦或無俟于批判矣，不知先生能許此意否？」

熊先生即在函上批復，謂「若尅就陰陽而言，則陰陽皆用也。不能以陽爲本，陰爲末。（尅就二字要緊）。約卽用見體說，則陰陽皆體之呈現固已。然陰有物化之勢，似反其本體之自性。……故學者用功，要在識得乾元性海，不爲物蔽，於此而言立本可也。」

這一段辯論大體到此爲止。父親於十二月廿四日復張公逸先生有云：

「熊公以數十年精研苦思之功，於生命源頭實有所見。但神遊雲間，不能下窺，以深入於生民疾苦，則亦難以通隱情、闡大願矣。公欲有立於仲尼之學，而二千餘年漢宋以來儒者，率指以爲奴而斥之，此爲摧陷廓清手段或快矣，以此釋歷史文化，處處成斷流絕港，將何以爲消息取通者乎？公高明自信，孤意獨往，無以涵容衆有，以見物育道行之盛，此中思爲彈正，卒難盡言，以是所見分歧，恐一時不易契合也。」

熊先生於五四年底來滬上與父親的第一階段的討論至此告一段落。熊先生於儒學生生之旨確有真切的把握，所以成爲當代新儒學的一位開山人物，絕非倖致。但到晚歲，心境極不平和，持論甚偏；與後輩論學，一味擊蒙，絕無相互攻取之效，可憾也。但有趣的是，父親把熊先生的《摧惑顯宗記》寄給我讀，我覺得不滿足，就自己在圖書館找了商務出版的《新唯識論》的語體文本來讀。由於父親的啓迪，我對於佛學的義理與體證，略有解悟。然而父親是由儒入釋，我卻是由釋入儒。五三、五四年也正在和父親通信討論學術。五三年四月廿五日父親有信給我說：

「書至，可見爲學不懈，足慰遠懷。然性習之辯，全落世解文字，無一頓悟處，於自性分上何有哉，勉之。熊翁《新論》，但是一家之言，法相唯識未爲究竟之論，奚泥也？」

五四年十一月又來函說：

「熊公《新論》，原是一家之言。公爲學數十年，於儒釋兩家義趣，甚極探研。於佛家體會處，遠過宋儒。而其爲學基本態度，仍未免宋儒窠臼也。公佛學智識，從歐陽宜黃得來。宜黃專研法相唯識。法相學者，主『真如不能隨緣』。公研久而不以爲然，謂其將『生滅』、『不生滅』截成二片，遂著論難之。難法相學者，則或然矣，而竟以此括佛家全體，斯惑也。賢首判法相爲大乘始教，久已以其爲不了義。而大乘從小乘出，不深味小乘宗趣，亦無以知大乘也。小乘是出世間法，必須先於『寂滅』、『生滅』兩端，截然判得明白，方能粉碎世情，清絕孤往，涅槃獨證。大乘尚須超越此一層次，觀空而不證，窮劫涉有，嚴土熱情，行所無事，乃至究竟菩提。此其所以爲『大』，爲『難』也。圓融不二，原須從身體力行壁立千仞中得來，方是真實。不然，雖研論多方，邏輯戲論而已矣。法相鄰近小教，理論遺蛻猶存，向上圓頓義，又是一番精彩。吾曾言之，公猶未之信也。」

這封信又恰可以爲父親與熊先生之間的討論作一參證。五五年（乙未）二月，祖父以八三高齡逝世。父親哀毀逾恆，熊先生數次來函勸慰，並贈訃儀，但父親堅辭不受。這一年之中彼此間並沒有嚴重的學術上的討論。熊先生爲了要找一清靜的環境寫作，不斷想覓新居；但在同時仍工作不輟。《原儒》上卷經校閱後出版，印存百部。十月間始起草下卷，到翌年夏初脫稿，印存如前。到冬天才有全本出版行世。